

启林有声：复旦百年修辞

祝克懿

“启林有声”取自成语“筌路蓝缕，以启山林”。真切表述了复旦几代学人走过的披荆斩棘、艰巨而辉煌的学科创业道路，记叙了复旦修辞学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

纪念复旦中文学科创立百年，修辞学科回溯学科源流与百年演变史，获得考察历史与当下对话、中西语言文化理念碰撞轨迹的契机，并因此梳理了几代学人为传承修辞文化、共建学术风范所做的竭诚努力。

“启林有声”取自成语“筌路蓝缕，以启山林”。“启林”谓陈望道、郭绍虞、吴文琪、赵景深、张世禄、郑业建诸前辈学者开疆辟壤、历尽艰辛，炼传统修辞学思想之美玉，假国外修辞理论之精石，开启了现代意义上修辞科学之学林，为现代修辞学的宏伟大业奠定了理论根基。

“有声”则谓由胡裕树先生领衔的复旦语言学科前辈时贤传承学术薪火、青蓝相继、砥砺奋进，在修辞学理论建构、语体学和语言风格学体系的创立、修辞学史的书写、文学语言研究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复旦修辞学科因此在中国语言学科之林中屹然而起，在人文学科的多元交响曲中畅然有声，形成复旦特色，并担当了领跑中国修辞学学科建设的历史重任。

“启林有声”真切表述了复旦几代学人走过的披荆斩棘、艰巨而辉煌的学科创业道路，记叙了复旦修辞学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与“启林有声”相辅相成的

“复旦百年修辞”确为一个真实的命题。

1905 年，复旦公学成立，至今已走过 112 年的辉煌历程；1917 年，复旦公学定名为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同时创立；值得注意的是，校史记载：复旦修辞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百年校史的首页也曾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复旦学人所进行的修辞研究活动更是跨越了从 19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叶的三个世纪。

众所周知，1898 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汇通汉语传统和拉丁语语法撰写的第一部语法著作，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新纪元。而据记载，这部著作的撰写有其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校长的参与。马相伯 1935 年 11 月 15 日答记者问“关于马眉叔先生”一文（朱维铮《马相伯集》，1996）证明其参与了《马氏文通》内容的修改和体系建构的具体工作。由于这部著作结合修辞讲语法，形成了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创立发展独特的影响力。有诸多研究为证：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将从古至今的修辞学术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修辞学术萌芽时期”（先秦至 19 世纪末）；二、“修辞文法混淆时期”（1898 年《马氏文通》出版至



1919 年）；三、“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1919—1932）。望老指出第二个时期即为修辞文法不分并产生弊端的时期：“从《马氏文通》出版以后”，“从故纸堆里去搬出以前那些修辞古说附和或混充文法，成了一个拿修辞论的材料混充文法的时期。”

吕叔湘先生在《重印〈马氏文通〉序》（《语文研究》，1983[1]）中也评论到：“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语法和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在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除此，我们还搜索到有十余篇论文均以《马氏文通》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7 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的修辞思想、修辞理论与方法、语法与修辞的结合等为题，专门讨论了《马氏文通》对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影响。可以说，马相伯校长参与《马氏文通》的写作，主观上是在推动西方语法理论的中国化，客观上是对中国修辞接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念起到了引航导路的作用，确立了现代修辞学暨复旦修辞学的历史起点。

复旦修辞学百年之历的第二理据是复旦大学创立之初，修辞教学活动即已渗透其间。

高万云教授在《马相伯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当代修辞学》，2010[3]）中称马相伯为“修辞学教育家”，“开创了复旦大学乃至中国修辞学教育与研究的新纪元”，并设专题讨论马相伯

1903—1905 创办复旦大学之初，在修辞学教育、论辩修辞、翻译修辞方面的贡献；特别介绍了马相伯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西赛罗修辞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西方研究传统，在复旦大学教学活动中大力推行论辩修辞，1905 年制定教学体制时还把“演说规则”写进了由他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宗廷虎、陈光磊教授也明确表述：“复旦大学有着优良的修辞学术传统。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所开设的课程中就有修辞学。后来李登辉校长也执教修辞学课程。”（《复旦学报》，1999[4]）

马相伯校长着力贯彻了他修辞学教育的现代理念，奠定了复旦大学修辞学教学和学科发展的最初基础。惜之，马相伯校长关于修辞学的见述散见于其哲学著作、文学批评、学术演讲中，没有形成体系呈现于世。

从源头上可追溯到的最早文字应为望老 1921 年 3 月 28 日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的美质》。文章使用白话的例句，开白话修辞的先河，掀开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册重要的一页。其后，望老为现代修辞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复旦修辞学的奠基呕心沥血、勤勉躬行。谨以邓明以教授《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

（下转 9 版）➡

◀（上接 7 版）

泓译注何先生《明清社会史论》是以 1967 年的修订本为底本。泓翻译时，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献，还原于译文之中，若有出入则以“译者注”形式说明，其特色是力求详尽，征引许多何先生未引用的史料和近人研究的成果。何先生认为这“足以教导入门者如何收集与运用史料”。由于这本书出版已五十多年，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出版，与何教授

对话，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或修正的文献资料，也以“译者注”形式说明。长达万言的“译者注”，何先生说：“对我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极有参考价值。”编排上也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与方式，将全书每一脚注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何先生说：“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感。”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得到何先生的赞许，应该是比英文原版更为理想的版本。

何先生过世之前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明

清社会史论〉中译本自序》上说道：

徐序与崔评对我早年学术著作价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二十余年来，孜孜不倦考证先秦思想与制度的精神支柱。

这本《明清社会史论》在我所有的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最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

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谈。因此我自退休以来二十余年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层楼，欣然颇有所获。此日回想，这本旧着可称我个人学术路程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今旧着以“译注”的新颜出现，于我个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对广大的中文读者有所帮助。

无奈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中文译本版权授权问题的拖延，非常遗憾，何先生生前只看到稿本，没看到联经平装版的《明清社会史论》出版，更不可能看到

中华《何炳棣著作集》精装本《明清社会史论》的出版。尤其，碍于两岸称谓的原则问题，北京中华书局无法从我们“科技部”得到简体字版授权。比台湾人口多出六七十倍的大陆同胞只能从网络流通的电子版阅读何先生的大著，相信不是何先生、联经公司和我们学术界愿意见到的。这真是一大无奈和遗憾。

（作者为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